

自選章節

輯一：

草原沒有風－追尋最後的圖博遊牧民族

■相遇：追尋的本身就是目的地

遇見次仁（Tsering）一家人，是在 2016 年的夏季，短暫的初遇，卻成為後來三年蹲點研究與書寫計畫的濫觴。

當時僅憑著手邊有限的資料，就決定先到羌塘，心中不無忐忑。在這片廣大區域中，認真說起來，放牧牛羊的遊牧民族並不難尋找，不過，我想要尋訪的對象，並非拉達克的牧民，而是一支從圖博（西藏）流亡到此處的遊牧民族；因為遍尋不著相關的紀錄，出發前，我幾乎抱持著「就算是大海撈針也要走上一回」的信念，樂觀地向自己精神喊話。

近年來觀光事業蒸蒸日上的拉達克地區，物價消費水準年年飛漲，在列城遊走許多旅行社探詢租車費用以及具有當地方言翻譯能力的司機，報價所費不貲。外國人前往該地區必須申請邊防證，而且單次最長停留時限包含往返車程只有七天。

以從列城前往著名遊牧民族聚落－摩里里湖（Tso Moriri）湖邊的科佐克村（Karzok）為例，單程距離約 220 公里，根據路況與路線不同，所須耗費的時間也會有很大的差異。若選擇經由標高 5358 公尺的唐郎拉隘口（Tanglang La pass），行經列城－馬納利（Leh-Manali）之間的高速公路，再轉往南邊的措卡（Tso Kar）湖邊的圖切村（Thukje），這條路線距離較遠，需時約 10-12 個小時，但可以飽覽高海拔山區（特別是五千公尺以上）的地形地貌；若是選擇另一側沿著印度河谷，經由楚瑪堂村（Chumathang，此處終年都有溫泉自地底湧出）再到瑪黑橋檢查站（Mahe Bridge J&K Police Check Post），這條順著河谷海拔較低的路線，需時約 7-8 小時，通常也是冬季各地大雪路封時，唯一有可能通車的交通要道。

因此仔細算來，扣除交通往返，事實上真正停留在當地的時間最多五天；而那還是只去一個地方，同時路程車況一切順利的情況。在我後來的經驗裡，要遇上如此諸事皆順的好運，簡直微乎其微。

為了避免惡性競爭造成任意哄抬價碼，當地政府其實出版了一本拉達克往返各地區景點與不同車型的收費標準指南，且定期更新，遊客可以依據該指南來判斷旅行社或計程車司機是否開價公允。不過，有標準定價同時也意味著，旅客幾乎沒有太多殺價的空間；而公定的價碼對我而言，實在是一筆沈重的負

擔。

拉達克每年只有六月到九月是觀光季節，所有倚靠觀光業及其周邊產業維生的各方人馬，在旺季來臨前便已經磨刀霍霍，就算我問遍列城的旅行社，得到的報價仍沒有太大的差異。硬著頭皮預付了包車與司機的費用，旅行社負責人也再三向我保證，這名來自科佐克村(Karzok)，父母曾經也是放牧牛羊的拉達克牧民，後來放棄遊牧生活，攜家帶眷移居列城的司機丹增先生，會提供我一切所需的協助；除了充當翻譯，還包含「尋找圖博遊牧民族」這項業務，雖然我當時不知道他要怎麼提供這個服務。

離開列城往南走約 47 公里會遇到烏普西 (Upshi) 檢查站，其位於一條連接圖博 (西藏) 與拉達克地區的古老貿易要道上，此處馬路兩旁餐館雜貨店林立，是前往草原前，最後一個堪稱繁華的小鎮聚落。選擇搭乘巴士前來或離開列城的旅客，都會經過這裡，司機通常會在此停靠讓乘客休息並且完成證件查驗。

經過烏普西檢查站之後，司機丹增建議先走列城－馬納利 (Leh-Manali) 高速公路，通過唐郎拉隘口 (Tanglang La pass) 之後往南行駛，會經過一大片遊牧民族帶著牲畜出沒的地區。「可以先從這個範圍開始『搜尋』」，司機丹增在駕駛座上，以生澀的英文沒有把握地和我說明。

在車上閒聊時才發現，當年父母決定舉家遷徙至列城時，司機丹增還只是十歲左右的孩童，對於遊牧生活其實印象並不深刻。他「約略」知悉拉達克牧民草場的範圍，但對遷徙路線沒有什麼具體的概念。透過車窗，舉目所及的範圍盡是一片又一片礫石遍佈的連綿荒漠，幾乎沒有任何植被覆蓋，少數的低矮灌木叢稀疏地點狀散布其間；直至此刻，我感覺到「大海撈針」並非出現在白日夢裡的幻象，而是真真切切地籠罩著沒有方向，什麼都不確定的自己。

夏日的高原天空總是澄澈蔚藍，大把大把的白雲在如波浪般綿亙不斷的山峰背脊，不吝惜地投射幻化不停的各式圖像，宛如以大地為舞台搬演的皮影戲劇場。一路上路況良好，為了因應逐年增加的國內遊客，看得出當地政府在維護這段列城－馬納利 (Leh-Manali) 高速公路的養護工作上，花費不少心思。沿途不時可見重型機車車隊從旁呼嘯而過，騎重機遊拉達克這幾年已經蔚為當地觀光活動的主流。

日陽直射下的溫暖，讓人昏昏欲睡，行走在緊貼著起伏山勢的蜿蜒山路上，具有某種類近搖籃曲的搖擺節奏，讓我幾度闔上雙眼。就在將睡未睡之際，我見到一大群山羊，點點白胖的身影正擠在路邊，準備過馬路。眼見羊群互相擠兌的模樣，十分滑稽，我坐起身來，從背包拿出相機準備拍照時，忽然瞥見不遠處的帳篷營地，飄揚著一面色彩鮮豔的旗幟；我頓時精神為之大振，連忙讓司機丹增立即停車。

果真踏破鐵鞋無覓處，當時我看到的，就是次仁在自家帳篷頂端插上的一面雪山獅子旗（註1）。在那個瞬間，我幾乎可以確知生活在那面旗幟下的人們，就是我要尋找的圖博（西藏）遊牧民族。

在舉目所及盡是荒漠的險地，標示著圖博（西藏）認同的雪獅旗的豔麗色彩顯得突兀，眼前風景總是一片灰褐色系，那樣的大紅大黃瀟灑著顯而易見，格格不入的孤寂。或許，那是他們在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展現身份認同的一種微小方式；次仁家的雪獅旗已經陳舊且破爛，不過，那卻是我當時以及後來多次在拉達克牧區旅行經驗中，見過的唯一一面。

我怯怯地走近帳篷，司機丹增停好車之後，便下車跟在我後頭。從帳篷裡走出來，微笑迎向我們的，是次仁的爸爸。頂著一頭看得出久未整理的有些糾結的灰髮，黝黑的面孔映襯著咧嘴笑容裡的一排牙齒，異常潔白整齊。身形壯碩的他，笑聲也十分爽朗洪量。司機丹增向他表明我們的來意，我注意到他使用的語言是拉達克語，而非藏語；兩者聽起來發音雖很接近，但其實差異很大。

次仁隨後也從帳篷裡竄了出來，他看見我這個外國人面孔，旋即以英文向我打了招呼，並熱情邀請我們到帳篷裡喝茶。

喝茶，是在牧區走跳，與牧民們打交道最重要的日常活動，這個必不可少的公關交流過程，我早深知其中的重要性，於是不假思索隨著次仁走進帳篷。

從明亮的戶外走近室內，光線明暗的對比讓眼睛一時間難以適應，次仁將我讓進最裡面的鋪墊，同時請已經在煮水的母親準備甜茶；以台灣人的標準而言，她是位身材嬌小的女性，但她所掌管的區域主宰著眾人溫飽，具有絕對的重要性。

坐定不久之後，已能看清帳篷裡的擺設，這是我第一次走近圖博牧民的日常生活現場，然而，眼前的一切景象，無論是光影、顏色、味道，甚至是焚燒乾牛糞的炊煙，竟然都透著一股似曾相識般的熟悉；我內心感到驚詫不已。

這一方天地的面積大約是兩至三坪，是整個家庭所有生活起居發生的場域。在這頂帳篷所暫時與外界隔絕出的空間，是客廳，是臥室，是廚房，是祈禱室，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也是家人情感交流的所在。帳篷的中心點是一個鐵製的火爐，附以一根聯通帳篷上方的煙囪，無論是煮食三餐茶水抑或取暖都需要仰賴它。以此中心為基準，面對著帳篷「正門」的是一個神龕，上面供有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照片以及一排供水的銀杯。站在正門往內看，左側的鋪墊是阿媽拉（藏語，母親之意）的座位，沿著帳篷邊緣整齊堆放各種食物、餐具、廚具，顯而易見是女主人的地盤。右側的鋪墊是阿爸拉（藏語，父親之意）的位置，訪客一般會與他並肩而坐。家裡的小孩通常都坐在靠近門邊的附近。

當阿媽拉安靜地為我們添上一杯又一杯的熱茶的同時，阿爸拉一邊手中搖

著轉經筒，一邊微笑地偶爾與司機丹增簡短的交流；我後來明白那是因為司機丹增並不懂得藏語，而阿爸拉的拉達克語有時表達也不那麼順暢。大部分時候次仁與我攀談著，對我來自的島嶼感到非常好奇的他，以一口流利的英文不停追問著關於外面世界的種種；在德里大學完成學士學位的次仁，顯然對德里以外的世界，有著更大的嚮往。

他的語言能力在往後不但成為我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圖博（西藏）牧民們，最好的溝通橋樑，也是開啟我認識圖博（西藏）遊牧民族生活的重要關鍵。

目前在德里近郊城市攻讀研究所學位的次仁，是家中長子，當時其他的弟弟妹妹都在印度各地求學無法返家，只有他剛好放假，才得以回來幫忙父母。我與他們初遇的那個夏季，恰好是他與父母以及其他仍未向城市投靠的親朋好友，一同紮營在草場較豐美的德布林（Debring）地區的時節。

原來粗估不過七八十戶的圖博遊牧聚落，目前仍在牧區放養牲畜，靠販賣羊毛維生的家庭，已剩下十餘戶，不過百人之數。他們沿著馬納利(Manali)通往列城的公路兩旁，各自選定了暫居的地點，搭建帳篷與臨時營地。這個紮營地點附近沒有河流或其他水源，十幾戶人家的用水全靠一口印度政府設置的抽水幫浦，抽取地下水供應。一望無際的光禿禿的礫石荒漠，白日裡總是黃沙漫天，而夜晚除了凜冽山風，更經常迎來夜行載貨卡車的轟隆聲響。

透過阿爸拉的敘述得知，他的父母是 1959 年之後跟隨達賴喇嘛流亡至印度的數萬圖博（西藏）難民的其中之一。當時筆路藍縷遷徙至此地的難民們，因為來到與家鄉迥異的國度，驟然面臨丕變的生活方式而難以適應者，所在多有。不過對這群搬遷至拉達克草原，與原鄉環境相似的圖博遊牧民族來說，傳統生活的存續考驗，卻出現在傳承了三代的今日，因為在異地始終無法根著與現代化科技的侵入，姿態才開始顯得風雨飄搖。

次仁的祖父母昔時帶著牛羊與全部家當來到印度時，並沒有真正想過從此不能再返還家鄉這件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一直到離世，他們的願望也跟隨著死亡而深埋異鄉。然而，在羌塘草原出生長大的阿爸拉與阿媽拉，即使一輩子都生活在這片土地，也仍然難以擺脫異鄉人沒有歸屬的命運，他們對於自己圖博（西藏）人的身份認同從無懷疑，但卻也說不上這份認同的堅持，對自己的日常生活有什麼實質的「好處」。

因為父母的支持而得已讀書深造的次仁，和從來沒離開過草原，一直使用藏文母語的父母不同的是：他在大城市求學，身邊周遭沒有和自己相同背景的同儕。他說英文，吃印度食物，在繁華喧囂的爾虞我詐中，渴望回家和父母團聚。在學校時，他總是時時懷念家鄉草原的遼闊氣息，而假日短暫重返遊牧生活時，他又心心念念想要出去外面的世界冒險。

那個下午的午茶時光，在尚未感覺到時間的腳步聲時，便告了一個段落。數年後我才明白，在不知不覺間，我已被捲入這個人數日益減少的族群，在草原上一趟又一趟看似重複但其實不然的生命流浪旅程，而自己卻渾然無所覺。

2014年七月，達賴喇嘛曾在列城附近約十公里處，流亡藏人聚集的地區 Choglamsar，舉辦了一場此地區睽違多年，對佛教徒而言非常殊勝的「時輪金剛法會」(Kalachakra)。來自喜馬拉雅山系各地不同地區族群的佛教徒蜂擁至列城，各種傳統服裝爭奇鬥豔，同場較勁，一時蔚為奇觀。那時我因著一些採訪工作而在城裡的一家民宿短居了半個月，因此結識了民宿的主人以及主人養的一隻名叫「阿吉」的拉布拉多犬。

2016年夏天與次仁一家道別回到列城後，我後來決定在列城多停留一段時日，便選擇再次入住有阿吉鎮守的民宿。

阿吉是一隻以為自己是人的狗，在庭院樹蔭下乘涼時，牠會選擇坐在提供給住宿客人使用的椅子上，過度豐腴的身材從背影看去，就像是一位正在享受日光浴，順便打瞌睡的老人。

那時我每天都會去列城舊城區附近的一座建於十五世紀的藏傳佛教寺廟，Tsemo Gonpa，在那裏一處掛滿風馬旗的山頭角落，靜坐冥想。要抵達位於制高點的六百年老廟，必須要穿越舊城區的陡峭巷弄，再攀爬一段之字陡上的山路；即使我的身體對於高海拔一向適應良好，也仍然爬得氣喘吁吁。

站在此處可以俯瞰整個列城城區、其周邊的小聚落、遍佈各處的印度軍營、更遠處山頭上的其他寺廟，以及環繞在周邊的雪山群峰。每當我伸展雙臂，大口地深呼吸的同時，總是會想起次仁那天在送我出帳篷時，語重心長地說：「我想我們很快就要搬去列城了。」

後來我們透過社群媒體一直保持聯繫。如果不是經由生活在有網路的城市的次仁，時不時和我分享家人的近況，要想在千里之外持續追蹤生活在完全沒有手機信號，更遑論網路連線的羌塘草原上的牧民行蹤，簡直比登天還難。

輯二：

時間的廢墟—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的那些人，那些事

■步驟一：前置，採買原料

「我們早期的羊毛是直接購自尼泊爾，但是當時收到的羊毛有很多沙子灰塵，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困擾。大概從 1985、86 年之後輾轉透過拉達克 (Ladakh) 的 TCV 幫忙，我們才開始從拉達克購買羊毛。盤商會先到中印邊界羌塘(Changthang)地區的牧民家裡，一家家拜訪收購，然後我們再直接到當地跟盤商議價進貨。

初期每年都要去買 6000 公斤的羊毛，從拉達克運到喀什米爾，再經德里，然後回到大吉嶺。2000 年以降，我們中心的人數遞減，生產力下降，現在我們買的數量大約是在 3,4000 公斤左右，也沒有每年都去了。」

從原本行駛的馬路急速迴轉，爬上一個斜度極大的陡坡，路面誇張的坑洞讓車身嚴重搖晃傾斜，我在前座幾度無法將自己的身體好好地安放在座位上，東倒西歪，模樣狼狽不堪。恰好僅容一台車身寬度的窄小山路緊貼著山壁，路的另一側是毫無屏蔽的深谷，幾處茶園間或點綴在視線所及的範圍。不過，一路戰戰兢兢太耗費心神，一直到車子駛進難民中心廣場，我都還沒能回過神來。

邊巴先生將沉重的大背包從車裡拿出交給我時，我正環顧眼前的水泥地籃球場以及周邊的建築，廣場上兩三個遊客正在自拍，幾隻狗各據角落補眠，濕漉漉的泥土地顯示剛剛不久前才下過一場大雨，有些冷肅的空氣提供了清新寒涼的佐證。一片霧氣瀰漫的白茫茫中，一台龐碩的大型巴士停在一旁，十分顯眼突兀，幾個斗大的英文字立即攫獲我的目光，「Love from Taiwan」。當下我的精神為之一振，手上的床蟲咬痕卻也同時隱隱發作。

傳說中的多吉經理從遠處向我們走來，上身微駝腳步略為細碎，戴著金屬鏡框眼鏡的臉上神情緊繃，一樣沒有笑容。「札西德勒！」我向他喊著，從這句「吉祥平安」問候中的上揚尾音裡，我知道自己非常開心能夠來到這裡；畢竟，「得救了！」這個念頭是我當時唯一的想法。

「歡迎來到大吉嶺，凱度先生在電話上跟我說了你的需求，已經都準備好了。」他說話的時候，眼睛一直望向我的後方，像是我身後還有別人。

「請問醫生什麼時候會看診，我想……」雖然覺得有些冒昧，手臂上的紅腫搔癢逼得我忍不住提問。

「已經都準備好了。」他又重複了一遍，目光依然掠過我的頭頂，落在不

明所以的方向。

多吉經理顯然沒有太多時間餘裕，他匆匆說完這句話之後，便簡短交代邊巴先生領著我到醫生宿舍，接著指派一名美麗的女孩——央金，來協助我準備生活所需用品。

醫生宿舍位在難民中心沿山而建的屋舍聚落最下方，要前往宿舍必須繞過零售展示中心（Show room）的前門，在它的後方有一道長長的階梯，下切至一處竹林環繞的木造建築群；那裡就是診所與宿舍，也是我將要暫居的生活空間。階梯上滿佈的綠色青苔說明了此處鮮有訪客，兩旁雜草已經四處蔓生，長度幾乎超過我的身高。邊巴先生不斷提醒我當心溼滑路面，他連連警告，加起來的句子總量甚至超過上山四個小時車程中，我們聊天內容的總和。

當我還在步履蹣跚，小心翼翼地一階一階拾級而下時，央金早就已經拿著清掃用具一溜煙跑下階梯，在迷霧中不見身影。我不知道自己究竟走了多久，但即使空氣中涼意襲人，我的前額仍沁出汗水，不由得感到身體內外都是飽滿的濕氣浸濡，異常黏膩。

終於來到耳聞多日的傳奇場域時，我難掩詫異。我知道這個診所在 1961 年由美國救濟服務處（American Relief Services）協助成立，58 年來造福了難民中心無數的家庭，甚或周邊地區城鎮成千上百的當地居民。我的確事先稍微想像過這個空間「應該」會是什麼樣子，不過，它完全超乎我的預期。

眼前這片空地各有左右兩排木造建築，安靜地蹲踞在樹林一角，左邊那排是病房以及診療室，右邊那排則是醫生與護理人員的宿舍。建築本身維護的還算完好，不過，外觀顏色多已脫落斑剝，許多橫樑皆有程度不一的蟲蝕孔洞。走在朽蝕的木頭地板上，難免吱嘎作響，不過連風吹過時，都能感覺整棟房子發出細微的窸窣碎裂聲音。是時間正在說話嗎？我不禁默默想著。

右排木造房屋一共有三個房間，央金正在打掃預計給我住的醫生房間，是其中最為寬敞，設備也相對齊全的；有兩張單人床，一張木桌，幾把木椅，以及一間浴室。因為已經久無人居，陳年的腐霉氣息瀰漫在四周，塵垢堆積甚厚一時難以清除。央金在鋪床單時，揚起一陣陣塵灰，「過一會兒就好了。」她笑著對我說，雙頰上的緋紅讓我想起自己手臂上的斑斕記號，下意識地又抓了幾下。

這時門外走廊突然出現一個蓄著五分頭，身形乾癯削瘦，面容黝黑且顴骨突出的中年男子，大聲地跟央金說話。他身上掛著一大串的鑰匙，正一支一支查找屬於我房門鎖頭的那把。他說他的名字叫做益西，說完便咯咯笑個不停，一直問：「妳叫什麼名字？」

央金在他背後對我做了手勢，意思是他頭腦有些問題，讓我別太在意。我後來得知，益西雖然和母親同住在中心配給的房子裡，不過，他經常不回家，

夜晚都會把自己反鎖在我斜對面的一個小房間裡打地鋪；而那個小房間是以前用來為病患洗澡的浴室兼廁所。

「我的藏文名字叫梅朵。」我鄭重地向益西自我介紹。

「梅朵！梅朵！」他喜孜孜地不停重複著。

央金裡裡外外收拾乾淨之後，向我大致介紹了附近的生活機能；基本上，我的一日三餐都在一名叫拉姆的女孩家搭伙，中心附近環境僻靜，走到最近的鎮上快的話至少都要花上 30 分鐘。她平日在隔壁的診所擔任護士，做一些簡單的工作。由於現在來到診所看病的病患人數稀少，並不忙碌，她通常白日裡例行的工作結束之後，就會坐在走廊的長椅上滑手機，打發時間。我後來經常看著她的背影，想著像她這樣在這裡出生長大的女孩，夢想會是什麼？

邊巴先生不知道從何處再度冒出來時，身上原本穿著的襯衫已經換成棉質吊嘎背心。「水塔那邊我已經弄好了，等一下浴室就會有水，電我也接好了，不過這裡常常會停電。」他不疾不徐地說著，手裡還拿著一支扳手。中心裡的人們都稱呼邊巴先生「mama」，聽起來就像中文裡的「媽媽」。關於這個綽號的由來，沒人能說得清楚，不過那陣子只要宿舍裡的水電有問題，眾人「凡事找mama」的基本原則，也讓我多多少少對邊巴先生的角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這裡沒有熱水，我們很少有機會洗熱水澡。妳如果需要的話，我明天帶一支電湯匙給妳。」央金隨後補充。擔心自己身上的汗臭味太明顯，我特意站在離她幾步的距離問：「請問醫生什麼時候會來？我在加爾各答被床蟲咬了，實在癢得很難受。」拉起衣袖，我有些難為情地展示著自己多日來的困擾。

「醫生昨天已經來過了，下次再來就是一星期後囉。」她甜笑著，一派輕鬆的姿態明白地傳遞了「這其實沒什麼」的訊息。

沒、有、醫、生。

那個當下，我竭盡全力隱忍，不讓自己在他們面前失望大哭的模樣，記憶猶新。而我也清楚地記得，當他們紛紛離開，返回自己在難民中心的家時，已經轉為緋黑的暮色裡，雷聲大響，旋即降下傾盆大雨，並且持續了一整夜。

分不清是雨水在黑暗的山城裡呼嘯奔流，還是自己因為極度沮喪疲憊而淚流漣漣所致，空氣裡揮之不去的潮濕包裹著周遭的一切，我陷入一種巨大而深沈的無力感，頹坐在床沿。

當懷抱著某種希望，不遠千里跋涉奔往心之所嚮，盤踞在腦海的這股「期待」究竟會帶著人們走向何處？我不禁想著自己當初為何要選擇此地作為研究的田野地，想著爬梳資料時，憑藉想像力建構的虛擬世界是如何讓自己傾心，進而下定決心來到這裡。

我的到訪明顯是主動的選擇，但對於半個世紀以前，從原鄉來到此處定居的流亡藏人們，是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與艱難心境。然而，我們的確在不同的

時空條件下，受到同一個地方的召喚前來，那股力量究竟是什麼？

被迫式的遷移，往往具有更深層而複雜的因素驅使著人們走上流離的道路。因為 1959 年中國共產政權在圖博（西藏）境內的侵略戰爭引發的逃亡潮，讓數以萬計的藏人跨越中印兩國綿延千里且爭議不斷的邊界，湧向印度，並在印度當局的同意之下，於不同省份地區建立起流亡藏人的屯墾區。

那段戰亂頻仍，烽火四起的時期，迫使藏人或是追隨流亡的達賴喇嘛，或是追求自由未來的生活，或是只求能繼續活下去而成群成羣地在異鄉流離失所。來到大吉嶺的圖博難民，主要是從錫金（Sikkim）進入，少數來自拉薩，日喀則和安多，持續增加的人數在 1970 年代達到最高峰，到了 1980、90 年代，人口開始逐步穩定遞減。作為最古老的難民中心之一的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在流亡社區裡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它和印度南方以務農為主要經濟活動來源的藏人屯墾區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後者是由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ala）的流亡政府與印度政府要求下所建立，而大吉嶺難民自助中心則是獨立運作，並不接受流亡政府直接管轄。

一手催生這個難民中心的，是來自中國蘇州的國民黨將軍朱世貴家庭的千金小姐——朱丹女士。原就讀於雲南西南聯大的她，後來回到南京拿到金陵女大社會工作系的學位，並在 1948 年與畢業於南京政治大學的嘉樂頓珠結婚；這樁婚姻不僅是跨文化（漢 / 藏）的結合，在當時風起雲湧的國際局勢裡，國民黨的將軍千金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家族的成員聯姻，更是引起許多圖博人民的議論。嘉樂頓珠後來在 2017 年於台灣出版的中文自傳《噶倫堡的製麵師》裡回憶著：

「我們在 1946 年相識相戀，隨即在上海的國際大飯店（Grand International Hotel）舉行婚禮，離開中國時，我們結婚已經兩年了。我認識朱丹，是他弟弟的介紹。她弟弟是一位海軍軍官，曾被國民黨送到倫敦接受軍事訓練。……朱丹開始跟我約會，一起旅遊觀光，最後我向她求婚。許多圖博人希望我跟圖博女士結婚，或者跟錫金、不丹的公主共結連理。但我是為愛而婚。」

也是為愛而婚的朱丹女士，從 1951 年開始就跟著夫婿定居大吉嶺，作為一位對圖博近代史有絕對影響力的外交政治家的夫人，比嘉樂頓珠年長六歲的她，因為在中國浸信醫院的醫療工作相關背景，讓她對於戰火下倖存的兒童與難民，懷有更多的同理與憐憫。面對 1959 年之後蜂擁而至大吉嶺的難民潮，面對家門口與日俱增，大排長龍乞食求溫飽的孤苦身影，她從一開始的日日接濟，轉而決定闢建一處收容的庇護所。

從無到有的第一步，是尋找土地。她在距離大吉嶺主要市區約莫 20 分鐘車

程，一處佔地約四英畝，名為「Hill Side」的小型莊園找到了理想的地點。這塊土地最初承租自當地的聖若瑟學校（St. Joseph's College），並於日後買下。因為地理位置保有獨立性，對外交通聯絡亦十分便利，很適合在當地複雜多元環境的文化脈絡裡，發展保有圖博傳統的社區。

不過，這個地方對於圖博難民更重要的另一層意義，是十三世達賴喇嘛在 1910 年至 1912 年流亡印度期間，停留的所在。他短暫棲身之處早已屋毀牆塌，只留下依稀可辨的地基和零碎的遺址，不過，光是他的曾經存在，對在異鄉精神無所依歸的他的後代子民而言，意義格外非凡。

所有的建設都需要金援，對於一開始資金不足的組織創辦者，這是無可避免的第一道難題。面對最初的創立經費，朱丹女士以販售當地足球比賽的門票與舉辦慈善表演的收入，再加以某些私人捐款而募得，在當時金額約為 3000 盧比。同時為了營運，成立了一個由十名成員組成的委員會（註 1），負責監督中心的發展和管理。嘉樂頓珠是該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值得一提的另一位著名成員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是在 1953 年 5 月與埃德蒙·希拉里爵士（Edmund Percival Hillary）一起創下人類史上首度攀登珠穆朗瑪峰的著名雪巴登山家。

面對自籌款項不足之處，亦獲得許多來自外界的捐款，包含印度中央救難協會（Central Relief Committee India），天主教慈善救濟會（Catholic Relief Services），紅十字會（The Red Cross）……等許多單位團體，都曾撥款贊助。同時在 1961 年，難民中心便已根據印度當地的法律，登記註冊成為一個合法的慈善組織，另外，當地政府對於中心接受的捐贈與販售的禮品也給予免徵所得稅的優惠待遇。

諸多知名人物包含印度前任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與希臘皇室成員都曾訪問參觀過難民中心，而十四世達賴喇嘛在 1975 年第一次造訪之後，分別在 1981 年、1993 年、以及 2004 年共四度前往此地。身為達賴喇嘛家族一份子的地位與光環，或許能為朱丹女士所開辦的難民中心，提供一定程度的資源挹注以及在國際社會開拓能見度，然而，頻繁接收外界援助的同時，也是不斷深化「難民」這層身份階級標籤的過程。從原鄉連根拔起而後來到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寄居地，適應本就困難重重，整個群體在「寄人籬下」的集體潛意識裡，因為尊嚴不能抬頭而處境更顯得左支右絀。

如果身體的被迫流亡是一種磨難，精神的自我矮化則是另一道難以掙脫的桎梏。站在這片過去生活經驗中，從未接觸且難以理解的陌生土地，同時面對再也不能返還故鄉的遺憾，除了身上的衣物，已孑然一身的流亡藏人們，那時在想些什麼？

當時，我頹坐在黑暗中腐霉的床沿，想著我也來到了這裡，旅程的辛苦不

及當年流徙荒民的萬分之一；想著我們都懷抱著某種冀望前來，但不同的是，我可以離開，他們不行。我看著床蟲辛辣的咬痕，紅腫兀自未消，奇癢無比，窗外的大雨仍然滂沱未止，心頭突然湧上一陣慶幸；慶幸自己頭頂還有一片屋簷遮風擋雨。如果沒有朱丹女士與當時的先民，胼手胝足努力換來的這一席之地，身處不同時空的我們，徬徨無助時，能站在哪裡？